

吴汉全 著



Karl Mar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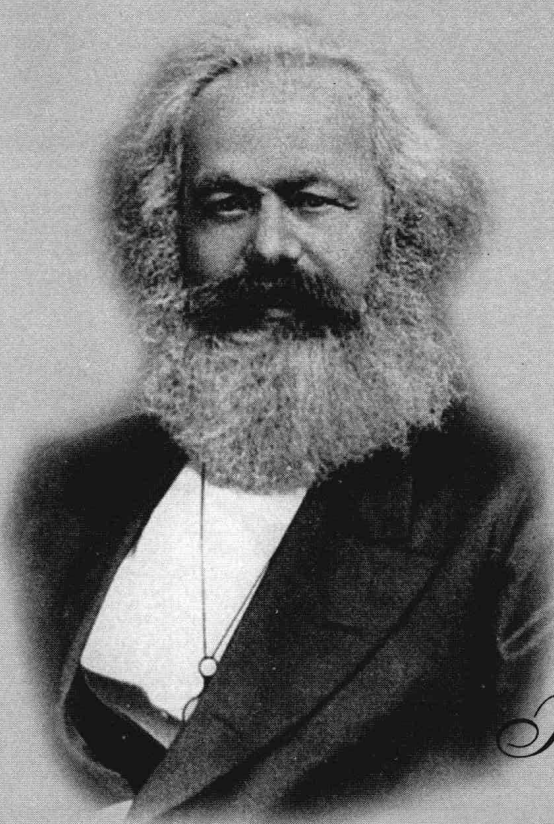
ZHONGGUO
MAKESIZHUYI
XUESHUSHIGAILUN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下册| 学术史概论

(1919~1949)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吴汉全 著



Karl Marx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下册| 学术史概论

(1919~1949)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 / 吴汉全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206-07218-5

I. ①中… II. ②吴…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8757 号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

著 者:吴汉全

责任编辑:陈亚南 封面设计:美印图文 责任校对:赵洪涛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45.875 字数:13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218-5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128.00 元(上、中、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我的学生吴汉全，寄来了他的书稿《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有一百二十多万字，算是大部头著作。我尽管工作较忙，但对于自己学生的书稿，总要认真地看看，提出一些意见，算是对他们研究工作的支持。这是我多年的习惯。

吴汉全是我早些年的博士生，以李大钊研究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见长，在学术界现在已经是很有影响了。他1999年到我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我给他出了《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博士论文题目，做得不错。博士论文出版后，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反响。他博士毕业后，回到徐州师范大学工作。不久晋升为教授，成为学科带头人。2008年调到南京，现在是南京审计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主持该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设工作。

我这个学生在学术上一直是很努力的，是一个勤奋上进的人。2002年，我给他的《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所做的“序”中，曾说：“吴汉全是非常勤奋的人，有一股子钻劲，不怕困难，再加上他原来的功底比较厚，对李大钊的著述十分熟悉，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他写出的博士论文《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还很像样子。”看来，我这话是说对了。他这几年出了不少成果，在《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党的文献》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参与了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中国现代社会史》、《中国当代社会史》等书的写作，获得了江苏省教育厅重大项目、教育部的规划项目以及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目前处于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是一位有成就的中年学者。

吴汉全花了10年时间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写成这部《中国

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专著。我很高兴地看到这部书稿，因为它确实不错，很有气势，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境地。该书以 1919—1949 年为时间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产生、发展、初步成熟的历史轨迹作了细致的梳理，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概貌；该书学术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广泛，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五十多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涉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多个学科；该书取材广泛，资料翔实，还引用了一些不为学术界注意的材料，并且注重对材料的解读和诠释，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看来，吴汉全确实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能写成这个样子，是很不容易的。我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专著。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我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要高度重视学术史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任何比较成熟的学科都有其学术史，尽管这种学术史在时间上有长短之分，在内容上有深浅之别。重视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传统，这需要努力发扬下去。学术史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文化史就需要研究学术史，这个道理并不难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也有一百多年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从五四时期算起也有九十多年了。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现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有着特殊影响与重要价值的文化现象。由此我想，学术史的研究应该把视角转到中国现当代学术方面，并且，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研究中，则需要高度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进程及其规律，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这不仅能够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能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历史的说明和学术的论证。道理很简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当今文化建设的本土化资源。

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应该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成果，集中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智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产物；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也提升和吸收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学术上的各个层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着本然的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由此，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也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一个角度切入。这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全面的理解。所谓全面地理解，就是说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层面，包括文化的层面、学术的层面、思想的层面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学术现象，有着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术中国化的具体情形与内容。我的看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更能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本质内容及其演变趋势，也能为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再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要有社会史研究的眼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既然是“史”的研究，那就要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路数，而社会史研究的眼光也就是一个当然的要求。我多年来提倡一个主张，即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这起初是对于中共历史学科的建设而言的。其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过程中，也应该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就是说，需要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变迁中，来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这一历史演进中和现实存在着的文化现象。只有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才能深化下去。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可以拓宽研究的视野，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譬如，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现当代时段中产生和发展，不仅有着经济变动、政治实践、文化发展的缘由，而且具有反映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诸多特

色。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注重经济变革的研究、注重政治出路的探讨、注重文化建设的研究并显示出其所关注的重点，为什么能够既反映社会变迁的需求及其成果，又积极地为推动社会变迁提供文化的积累和学术上的依据。

又再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要紧密切联系近现代中国社会中思潮的变动。社会思潮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中一种突出的现象，本质上是社会变革的反映，也有着各自的学理根据，对社会的思想、文化、学术有着较大的影响。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之中，马克思主义学术是在与各种思潮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自然与各种思潮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因而，需要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与社会思潮的研究联系起来，找出其中的相互关系，如此才能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具体情形及其特点。譬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就与“敌对思潮”有着联系。一般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与敌对思潮存在着排斥的关系，它们之间的争论是经常性存在着的事实，这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如此，我们就要研究这种“排斥”、“争论”的具体表征、基本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影响。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与敌对思潮总体上存在着排斥关系，但在特殊情形下是否也有尊重、吸纳对方部分观点的情况？或者，对对方的某些看法是否也有着相似的方面？这需要研究。又譬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与“友好思潮”（如三民主义）是什么关系呢？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学术对这种“友好思潮”总体上看是采取了吸收、鉴戒的态度，但之间也是有争论的，并且这种争论有时可能是很激烈的，有着为维护各自的“真理”而争辩的情况。因为，即使是友好思潮，也是有缺陷的，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看法存在着差距，这就必然会有争论。这就是说，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一定要注意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思潮，善于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予以正确地辨析，厘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应该说是有助于研究工作深入的。

最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要依据新的视角与时俱进

地加以诠释。学术研究离不开诠释，并且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诠释；但诠释不是任意为之的，必须依据现实的理念、时代的精神、知识的积累，有序地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一种既存的文化现象，并且今天仍在继续演变之中，与当今的文化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此情形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没有新的理论、新的视角、新的诠释，是难以把握的。譬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出来的，需要有新的眼光，需要转换视角，当然也需要对原有材料予以新的解读和诠释。众所周知，陈独秀是政治人物，因而人们过去很长时段里，不大重视研究其学术思想。其实，以新的眼光看，他的学术思想是很丰富的，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我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序”中就曾说过这样的话：“陈独秀既是政治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中央第一届至第五届的领导者，又是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一生，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伦理、法律、社会生活、文字学等众多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以往的研究者已涉猎这方面的研究，但还很不够。这种研究，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广度。”我说这样的话，就是提示学术界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不仅要研究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也要通过研究展示出陈独秀作为学者的一面。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的出版，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对于现今文化建设的积极推进，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值得研究者关注。

张静如

2010年6月于北京

导 论

本书是关于 1919—1949 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和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这一时段内产生、发展、初步成熟的历程，力图勾勒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演变轨迹，并期望从中汲取有益的学术智慧，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繁荣提供本土化的学术资源。

一、“学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

开展研究工作，需要对相关概念予以诠释和界定，这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不过，限于个人的功力，本书不打算沿用学术界通常使用的“下定义”的办法。因为在笔者看来，任何定义都有其缺点，都有待于不断地完善，而且所下的“定义”免不了会设置一些框框，有时也会限制人们的思考。于此，倒不如对使用的概念只是作初步的描述，表示一下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而给人们留下更多的理解空间。

1. 何谓“学术”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则需要对“学术”一词有所认识和说明。不过，在现今的学术语境之下，对“学术”一词进行界定颇不容易，需要就“学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含义有所认知。

中国古代学者论“学”者不少，但大部分叙说的是“学”之功用，且侧重于人身修养，与西人面向自然、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不过，也有将“学”与规律的探寻相联系的学者。如邵雍就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①。至于从总体来论说学术者，亦不乏其人。颜元说：“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②章学诚则更进一层，不仅提出学术之功用问题，认为“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③，而且阐明学术有“二途”，亦即“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④。中国古代学者对“学术”的阐述，虽与我们现今的理解有所差距，但仍然是学术问题研考的重要渊源，也有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方面。

对“学术”进行界定而接近今义的，是严复、梁启超等一批受西学科学观和进化论影响的近代学者。严复认为：“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⑤梁启超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⑥显然，严复、梁启超对“学术”的界定，一方面是肯定其科学的品格，具有寻求真理、发现规律的内容，另一方面又确认其具有功用性的追求，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着重要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将“学”与“术”合以观之，则“学术”兼具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内容。

笔者认为，近代严复、梁启超等人如上的解析是有道理的，依然是当今关于“学术”概念分析的重要参考。只是“学术”一词，似乎其本然的内容在“学”，亦即形而上，也就是说学术是一种知识体系和系统化的认识，侧重于学理的探索与规律性的发现。简言之，学术是一种学问。学术既然是“学”，则必须探寻规律，发现真知，这是其内在属性和基本要求；因而，学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

①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② 颜元：《习斋记余》卷一《未坠集序》。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下）》。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下）》。

⑤ 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5页。

⑥ 梁启超：《学与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和系统化的认识，其第一任务在于发现规律。在这种意义上，笔者同意通行的解释，即学术是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不过，学术是社会中的学术，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作为上层建筑的学术，受社会整个的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有作用于社会的功用。因此，研究学术自然要研究其功用，探索学术如何为社会服务的问题。

学术是注重分类的，并在分类中不断发展，这在中外学术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因而是我们在研究学术问题所应重视的。中国古代有“经史子集”的说法，其所对应者为哲学（儒学）、史学、子学、文学，但大体上只是一种对学术资料的分类。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将学术分为三种：一为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二为通几之学，即哲学；三为宰理之学，即关于社会政治的学说。清代以来，许多学者将学术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即哲学；二为考据之学，即史学；三为词章之学，即文学。进入近代，注重国计民生的学者积极提倡经世之学，即关于政治经济的学问。在西方学术史上，继培根之后的孔德、斯宾塞等都对学问分类有所贡献。孔德从实证主义哲学观出发，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把科学依次分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社会物理学）六类。斯宾塞则把知识分为低级的知识、科学知识和哲学三类，认为“最低级的知识是完全不相联系的知识，科学是部分有联系的知识，哲学则是完全相联系的知识”^①。孔德、斯宾塞的学问分类适应当代学问所达到的程度，与培根的分类法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而是一个积极的有意义的努力。

学术分类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重视学术分类的。陈独秀从“科学”的视角来进行学术的分类，他在1920年指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

^① 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以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①李大钊在史学研究中，依据其他学问与史学的关系，将史学以外的相关学问又分为六类。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指出：“与史学有较近的关系的学问，大别可分为六类：第一类，言语学，文学。第二类，哲学，心理学，伦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宗教学。第三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第四类，人类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书学。第五类，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科学，及其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第六类，地理学。”^②李大钊对学问的分类是比较细的，力图将学问区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大钊的学术分类体系中，从学问之间相互联系性出发，特别强调建立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求学术研究的深入。李大钊说：“综合种种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所考究所叙述者，就其总体以考察记述那样人类于社会活动的产物，以寻其经历而明其进化的由来，关于人文现象的全体以研考其发达的次第者，最宜称为人文史，亦可称为文化史。”他又说：“对于综合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个的人文以为考究与记述的人文史或文化史（亦称文明史），尚有人文学或文化学成立的必要。”^③李大钊所设计的“人文学亦曰文化学”，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学科：教育学、美学、哲学、文学、宗教学、伦理学（道德学）、法理学、经

^①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② 《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

^③ 《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97页。

济学、政治学等；他所设计的“人文史亦曰文化史”则是指教育史、美术史、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伦理史（道德史）、法律史、经济史、政治史等^①。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倡导建立“人文学”并主张进行综合的研究，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也注重学问的分类，界定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哲学之间的关系，1942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②大致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分类，承继了近代西方学者的分类法，但也有所变化与创新。

2. 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

五四时期，中国传统学术、中国近代学术和西方学术在冲突和融合中而开始构建中国现代学术^③，学术的种类增多，内容丰富、更新，处于由近代学术到现代学术的全面转型时期。中国现代学术正是在五四时期创建和发展起来的，这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学术最为有生命力，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前进方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在“五四”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为研究对象，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辛勤

① 《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816页。

③ 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笔者以为应该以五四时期为起点。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联系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学术有其自律性，但在根本上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大势，也不可能不反映时代的要求。还要说明的是，学术研究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指导理论也规定着学术发展的方向。五四时期，唯物史观被引进中国并运用到学术研究领域，使学术发展出现新的态势，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发展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后，以进化论指导的学术研究虽然也在发展，并且取得很大成果；但从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并指示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目标，导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鉴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将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起点。

耕耘,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不断提升和汲取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经验,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一经产生,不仅积极担负起从学术、文化等方面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其本身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重要资源,在建设先进文化、推进文化建设、构建现代学术体系、彰显现代精神传统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继承。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瞿秋白在1923年为《新青年》所发布的“新宣言”中,对“社会科学”做过较为全面的阐述,其基本观点是:(1)“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纵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其结论”;(2)“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3)“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4)“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的文化单位”,因而社会科学之研究“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得有所借鉴”;(5)“社会科学,因研究之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其客观的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应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①在瞿秋白看来,五四时期中国进到社会科学阶段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他指出:“只看中国近几年来采纳迎受所谓‘西方文明’的态度和顺序,便可知道了:首先是军事技术交通技术,进而至自然科学数理科学,再进而至社会科学。可见现时中国社会受外来的影响,骤

^①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1页。

至复杂，求解释它的需要，已经非常迫切。由浮泛的表面的军事技术之改进，而不得不求此技术之根源于自然科学数理科学；由模仿的急功近利的政治制度之改变，而不得不求此种制度之原理于社会科学。”^① 具体表征是：一是“近年来由空论的社会主义思想进于更有系统的社会科学之研究，以求确切的了解其所要改造之对象，亦即为实际行动所推演求进的结果——这确是当然的倾向”；二是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兴起，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态势，“实因社会现象的日益复杂，不得不要求文字上的革命，以应各种科学之需要——文字原为一切科学的工具”^②。关于社会科学的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恽代英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假定社会是一个工厂，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有能管理社会的人，一切的人有一种技术，便得一种技术的用，没有管理的人，只有机械，只有象机械的工人、技术家，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绩来。……中国政治上了轨道，能够有足够的本国技术家，自然是再好没有了的。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我们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事情的昏话。越是学技术科学的人，越是要希望有能研究社会科学，以使中国进步的人，好使他们可以用技术为中国切实的做事。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若时局不转移，中国的事业，一天天陷落到外国人手里，纵然有几千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所以，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③ 潘梓年在1939年更进一步认为，社会科学在中国更有被重视的理由。他指出：“目前一般人士，对自然科学可说已开始重视。不过实际上的重视还是偏在自然科学的技术方面，对于自

① 《现代中国所应当有的“上海大学”》（1923年7月），《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② 《现代中国所应当有的“上海大学”》（1923年7月），《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③ 《学术与救国》（1923年12月），《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8页。

然科学理论，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等等，还未免重视得不够，还是让少数自然科学家在四向呼吁。至于社会科学，那就更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这实在是莫大的缺陷。这两种科学实在同样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说对目前中国不能不有过轻重缓急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暂时有比自然科学更值得被人重视的理由。因为要求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致误入歧途，必须首先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正确的解决途径，作为基础才行。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同样的自然科学，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发展起来就真正成为国利民福，在法西斯国家发展起来就适足以祸国殃民；这里的差别，正就在于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都能正确地解决了，另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还没有能够解决，或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有需乎社会科学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对于目前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① 正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以及在学术研究中孜孜不倦地努力，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产生和发展的进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关于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坚持的问题，本书的各章节中有着具体的说明，这里不赘述。这里只想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研究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论断，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学术上、理论上的论证。

首先，最早将“主义”与“科学”对接，使“主义”具有科学的品格，首推陈独秀。

陈独秀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一主张，从科学的方法（归纳法）入手来建立两者的联系，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他说：“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怎么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来证明一个原理。这便是归纳法与演绎法

^① 潘梓年：《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新华日报》（重庆）1944年3月26日。

相反之文。我们自然对于这两种方法，应该互为应用。但是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一个原理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一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依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① 在科学话语的五四思想界，陈独秀由“科学方法”是归纳法来说明马克思学说具有“科学”性质，是借用科学话语权势来提升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地位的一个重大努力。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作出了合理性的解说，也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科学的对接提示出具体的方向。

其后，陈独秀又进一步认定唯物史观是“科学”，并从科学是发现因果规律的角度予以论证。在陈独秀的逻辑系统中，是否是科学就在于其是否能够遵循“因果律”，唯物史观是否是科学也就要看唯物史观能否从科学是发现和运用“因果律”这一论点出发，正确地解释社会现象及“社会心理”等问题。他这样指出：“社会现象变迁之动因及大多数个人对此变迁之态度即社会心理，推求其最初原因都是物质的，而为因果律所支配，因此，社会科学家才有加以物质的因果的说明之可能（幼稚的社会科学家所说明的因果是否和社会现象之实际，这是另一个问题。），至于个人对于各项问题之态度之变迁，其异时而态度不同者（即甲日以为是，乙日又以为非），则仍是明显的社会心理或隐伏的社会实质变迁之结果；其同时而态度不同者（即甲以为然，乙以为否。），则因社会之新旧变迁终属相续而相错，没有截然的突变，于是个人不同的历史和环境遂造成个人不同的态度，即不同的人生观；这些个人态度

^①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65页。